基于公众讨论热词的垃圾分类政策执行阻力与对策研究

唐嘉彤，张宝生

（哈尔滨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25）

摘要：垃圾分类政策全面推行以来，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真实反映了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以社交平台相关文本数据为样本，结合数据清洗、分词、情感分类及词云分析，并辅以半结构化访谈，识别垃圾分类政策执行中的主要阻力。研究发现，当前政策执行面临三类核心阻力，分类标准模糊且复杂，忽视居民实际认知能力；社区投放设施配置与居民实际需求不匹配；定时定点投放等制度安排与多数居民生活节奏存在错位。针对上述问题，围绕分类标准的简化与统一、家庭与社区投放环节的衔接、激励机制的多元化设计三个方向提出优化建议，以期为垃圾分类政策的持续改进提供参考。

关键词：垃圾分类；政策执行；公众参与；政策阻力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16－0265－07

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是一项覆盖面广、关联主体多、环节复杂且需公众参与的公共政策，兼具社会性、公益性和生态性，其效果受经济水平、设施完善度和居民素养影响，同时投入大、短期见效慢、经济收益率低。自 2019 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推进垃圾分类；2021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管理、清运与处理机制。各地出台相关管理制度推进垃圾分类，尤其是试点城市及其下属街道和社区，加大了生活垃圾治理的力度[1]。然而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全国 46 个垃圾分类重点试点城市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平均仅为 30.4%，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尽管官方渠道不断加大宣传力度，但实际生活中公众对分类标准仍然理解不够导致实际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公众的抱怨依然频繁出现在社交媒体讨论中。

以微博平台为例，垃圾分类讨论长期存在，公众既分享个人经验，也表达对政策执行的各种不满，这些负面评论成为了解执行困境的重要来源。本文通过抓取相关微博文本，识别公众讨论的高频问题，揭示政策执行的关键阻力，并提出可行性优化策略。既有研究多侧重制度设计或居民行为影响因素，采用问卷、访谈和统计分析，但难以捕捉公众即时态度和具体执行摩擦。相比之下，社交媒体自发讨论、问题指向明确，是观察政策执行阻力的有效窗口。

从政策执行理论视角看，执行偏差并非源于政策目标本身，而是政策文本、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互动的结果。Smith[3]于 1973 年提出的政策执行过程模型提供了理解政策互动的系统框架。该模型认为，政策执行效果由四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决定：一是理想化政策，即政策目标与规范体系，其可操作性影响落地效果；二是执行机构，包括组织与人员，其能力、资源与激励结构影响政策传导；三是目标群体，即公众，其认知、行为习惯与生活节奏影响政策接受与践行；四是环境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条件，为执行提供背景约束。任一要素出现错位，均可能产生执行阻力。居民在日常操作中遇到的分类困惑、设施不足和时间冲突，正是上述四个要素在具体场景中发生摩擦的集中体现，构成政策落地的结构性问题。以 Smith 模型为分析框架，通过对社交媒体高频词与负面情绪的系统梳理，可以在较低研究成本下还原这些摩擦的深层成

收稿日期：2026-04-16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H2024G011)；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2SHB172)

作者简介：唐嘉彤(2002—)，女，黑龙江鸡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网络空间治理；通信作者张宝生(1982—)，男，辽宁昌图人，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网络空间治理、科技管理、公共政策。

因，为政策调整提供针对性参考。

基于此，本文以舆情分析为切入，结合微博文本和社区居民访谈，以 Smith 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理论依托，重点识别公众在垃圾分类执行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关键阻力，并据此提出可行优化对策。研究思路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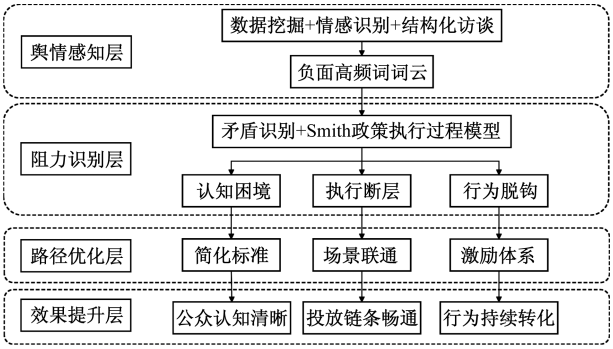


图 1　舆情视角下的垃圾分类执行模型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当前微博已成为各类信息的主要交流平台，鉴于微博在公众表达和社会议题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选择该平台作为舆情数据采集的主要来源。在当前生态可持续发展、减轻环境污染进程中，公众被认为是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的重要主体之一[4]。因此使用 Python 爬虫，以“垃圾分类”为关键词抓取公开可见的评论、帖子和转发内容，获取的数据涵盖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真实公众反馈。数据收集时间选取在垃圾分类政策全面推进后，确保样本具有可信度。

1.2　数据处理

共获取原始微博文本数据 605 条。为提高分析的针对性，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采用 Python 对文本预处理与分析。在数据预处理方面，首先对文本数据进行去重和清洗操作。在数据清洗之后对数据进行二次去重，之后采用 Jieba 对文本进行中文分词[5]，将连续文本拆解为具有独立意义的词汇单元。在分词时增加自定义词表，使用哈尔滨工业大学停用词表过滤无意义的词语，并在后续工作中持续更新停用词表。在分词操作中，仅保留名词、动名词、其他专名。经过去重、数据清洗和二次去重的处理之后，使用工具 SnowNLP 对文本进行情感分类，将评论划分为正面、中性和负面三类。情感分类结果如图 2 所示，在 605 条有效文本中，负面评论 325 条，占比为 54%；正面评论 235 条，占比为 39%；中性评论 45 条，占比为 7%。负面评论占比过半，表明公众对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现状存在较为普遍的不满情绪，在整体舆情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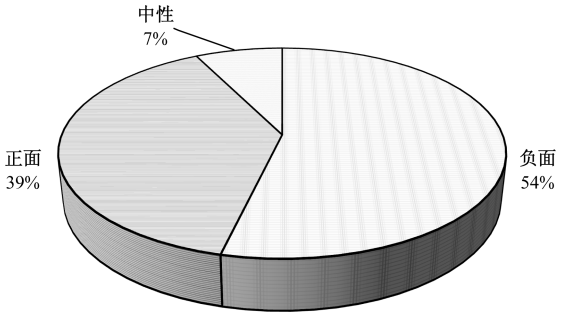


图 2　情感分类占比

基于此，将情感倾向为“负面”的 325 条评论作为核心分析样本。相比正面与中性评论，负面文本通常指向政策执行中的具体问题与操作障碍，信息密度更高，更能集中反映公众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满，是识别政策阻力与优化路径的重点来源。在此基础上，使用词频统计方法对 325 条负面文本中的词语出现频次进行统计，识别出公众在讨论垃圾分类时高频提及的关键词，为后续阻力分析提供实证依据。

1.3　访谈设计

为进一步验证微博舆情分析的结论，对部分社区居民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共 10 人，涵盖不同年龄和身份，如职场白领、教师、快递员、社区退休居民等（表 1）。

这种多元化的样本构成旨在捕捉不同社会身份情况下，公众对于垃圾分类政策执行阻力的差异化感知。访谈围绕分类标准理解、家庭与公共设施使用情况、环保意愿与现实操作冲突三个主题展开。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统计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职业
受访者 A	男	28	企业职员
受访者 B	女	65	退休居民
受访者 C	男	35	高校教师
受访者 D	女	42	社区居民
受访者 E	男	30	快递员
受访者 F	男	32	网店店主
受访者 G	女	22	大学生
受访者 H	女	50	物业人员
受访者 I	女	38	餐饮店主
受访者 J	男	45	机关公务员

访谈采取匿名化处理,避免泄露任何个人信息或身份特征,每条记录均整理归档,用于辅助分析公众在垃圾分类执行中的真实体验。这些访谈数据可以与微博舆情分析的词频统计和情感分析形成互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2 公众视角下垃圾分类的阻力识别

2.1 垃圾分类文本词云图

为更直观地呈现公众讨论中的高频词及其关注结构,引入 WordCloud 词云图可视化工具[6],绘制垃圾分类文本词云图如图 3 所示。

公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负面反馈主要集中于三类典型矛盾:一是分类标准模糊导致居民长期面临归类困惑;二是家庭端与公共端设施衔接缺失,造成执行断裂;三是投放时间限制与回收点稀缺,导致居民的环保意愿难以转化为持续行为。

为进一步量化公众讨论的关注结构,在词云图的基础上,对 325 条负面评论的分词结果进行词频统计,以词语出现频次与频率作为衡量公众关注强度的指标。在剔除搜索关键词本身("垃圾""分类")及泛化无实质意义词语后,提取出现频次最高的 10 个关键词,如表 2 所示。



图 3 垃圾分类文本数据词云图

表 2 负面评论高频词汇统计

词语	频次	频率/%
厨余	168	2.45
环保	129	1.88
垃圾桶	109	1.59
垃圾处理	71	1.03
小区	40	0.58
投放	39	0.57
饮料瓶	19	0.28
街道	19	0.28
塑料袋	17	0.25
误区	15	0.22

上述高频词在语义层面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聚类特征,可依其内容指向归纳为三组。

第一组为分类认知困难词,包括"厨余""塑料袋""饮料瓶""误区"。其中,"厨余"频次最高,表明居民对厨余垃圾边界(如骨头、汤汁、油纸)存在持续困惑;"塑料袋""饮料瓶"反映材质混合物品的分类归属长期模糊;"误区"则显示居民对现行分类标准存在系统性理解偏差,政策知识未能有效传导至基层。

第二组为设施与场景脱节词,包括"垃圾桶""投放""小区""街道"。"小区""街道"反映末端执行场景的系统性断裂,而"垃圾桶""投放"揭示设备不足、标识不清和投放时间受限等操作障碍,使居民在完成家庭端分类后仍面临无处投放的困境。

第三组为环保意愿与现实操作脱节词,包括"环保"与"垃圾处理"。"环保"高频出现反映居民环保意愿难以转化为实际行为,受限于回收点稀缺和投放时间限制;"垃圾处理"的高频出现显示居民关注后端分类流程,前端分类完成后仍可能被混合处理,削弱了行为持续性和参与动力。

2.2 垃圾分类政策执行阻力

2.2.1 对分类细则的理解困扰

第一类阻力体现在公众在垃圾分类细则理解上存在显著困扰。词频分析显示,"厨余""可回收""饮料瓶"等词高频出现,反映居民在处理复杂物品时常陷入两难,既担心投错,又难以迅速判断。访谈进一步印证了这一问题。

"我们家每天做饭产生的厨余垃圾很多,我总是不确定骨头、油纸该怎么分类,每次都得查半天。"

——受访者 A(企业职员)

"饮料瓶和塑料包装混在一起,有时候干脆都放可回收类了,怕放错。"

——受访者 B(退休社区居民)

这表明,分类标准模糊导致的操作困惑在不同年龄和职业群体中普遍存在。一些地区的五分类或七分类标准在缺乏充分引导的情况下增加了居民学习负担,尤其是厨余垃圾的边界问题(如骨头、汤汁、油纸)缺乏统一指引,形成参与门槛。由此,居民在认知成本高、操作不便的情况下,其分类积极性和主动参与热情受到显著影响,这是政策执行中的基础性阻力。

2.2.2 执行场景之间的脱节

第二类阻力主要表现为执行场景的脱节。词

频表显示,“小区”“垃圾桶”等词出现频率较高,反映公共设施配置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断层。居民在家庭内部可能已掌握分类知识并设立干湿垃圾桶,但一旦离开家门,公共区域缺乏相应投放设备或仅设置“其他垃圾”桶,使分类行为难以延续。社区作为政策末端执行主体,承担宣传、设施配置和居民引导等任务,但由于人力和资源有限,执行效果在老旧小区尤为薄弱。一些小区存在“宣传到位、硬件不足”的矛盾,居民虽了解分类规则,却难以将知识转化为实际行为。更严重的是,即使居民完成家庭端分类,末端运输环节仍可能混合投放垃圾,削弱分类意义,反映出政策在设施衔接与执行落地上的结构性问题。上述设施层面的阻力在大规模调查数据中同样得到了体现。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发布的《2023年102城市垃圾分类指数年度报告》显示,在纳入评价的102个城市中,“撤桶建站、定时投放、监督指导”三项关键执行措施在多数城市未能有效落实,重点城市平均得分仅为20.67,非重点城市平均得分更低至7.15,城市之间差异显著。这表明设施配置不足与执行衔接断裂,是当前全国范围内垃圾分类政策执行面临的普遍结构性问题,而非个别城市的特殊困境。这一宏观判断在个体层面同样得到了印证。

“家里分类做得很规范,但一出小区就找不到对应的投放点,只能随手扔到普通垃圾桶里。”

——受访者C(高校教师)

“明明想做好分类,可家里和小区的设施不匹配,最后还是随手扔了。”

——受访者D(社区居民)

两位受访者的表述清晰地呈现了“家庭端分类完成、社区端承接失效”的场景断裂模式,即居民的分类意愿和行为在跨越家门口这一节点后遭遇了制度性阻断。

2.2.3 环保意识与现实操作之间的脱节

第三类阻力表现为环保意识与实际行为之间的脱节。词频显示,“环保”“垃圾处理”等高频词表明居民在态度上高度支持垃圾分类,但实际参与行为有限,且在操作中遇到多种困境。部分居民尝试主动分类可回收物,但由于回收点稀缺和处理流程复杂,行为难以持续。此外,制度安排与居民日常节奏存在冲突。一些小区推行“定时定点投放”的制度,尽管初衷在于提升处理效率,但大多数居民具有家庭居民和单位职工的双重身份,当双重身份与垃圾分类行为导向不一致时,导致居民的参与意愿不积极,那么很难实现良好的治理效果[7]。这种意愿与行为之间的落差,在大样本调研中得到了量化验证。中国农业大学李彦明团队2022年在全国十余座城市开展的调研显示,虽然超过九成的受访居民表示愿意进行垃圾分类,但承认自己实际能够做到的比例为18%~21%。这一高达70个百分点以上的意愿-行为落差,深刻揭示了当前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的“知行不一”困境。这一宏观规律在访谈中得到了具体印证。

“小区投放时间和我上下班时间冲突,经常错过,只能堆到家里。”

——受访者E(快递员)

“我很支持环保,但回收点离家太远,定时投放又赶不上,久而久之也就懒得坚持了。”

——受访者F(网店店主)

这些表述与微博样本中“我每天上班早,回家晚,规定时间根本赶不上,怎么去环保?”等评论高度吻合,表明操作便利性不足与生活节奏冲突普遍存在,不仅削弱居民对政策的认同,也阻碍环保理念向日常实践转化。在大众眼中,环保不应成为额外负担,而应融入日常生活的普通环节之中。

2.3 阻力产生的原因分析

从整体结构来看,上述三类阻力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相互叠加、相互强化,形成垃圾分类政策推进中的复合型执行困境。借助Smith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框架,可以对上述阻力的成因作出更为系统的解释。

就理想化政策层面而言,第一类阻力的根源正在于此,现行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更多遵循废弃物处理的技术逻辑,而对居民日常生活中物品形态的复杂性考虑不足。骨头、油纸、混合包装等边界物品的归类问题长期缺乏权威、统一且易于查阅的操作指引,使分类细则在实践中难以被普通居民掌握。政策设计对执行端认知成本的低估,是第一类阻力形成的制度根源,也是后续需要通过简化分类标准、开发智能查询工具加以纠正的核心问题所在。

就执行机构层面而言,第二类阻力折射出基层执行机构能力与政策要求之间的落差。社区作为垃圾分类政策的末端执行主体,承担着设施配置、日常监督与居民引导等多重职能,但受制于编制紧缺、经费有限等现实约束,其实际执行能力与政策

所要求的标准之间存在差距。这种“权责不对等”的执行格局,使得家庭端与公共端之间的场景衔接长期处于薄弱状态,政策在“最后一公里”的落地效果因此大打折扣。摆脱这一困境,需要从供给侧出发系统推进家庭与公共场景的设施衔接,完善末端执行机构的资源保障。

就目标群体层面而言,第三类阻力的成因并非居民环保意识的缺失,而在于制度设计对目标群体实际生活状态的把握不够准确。以“定时定点投放”为例,该制度在执行层面隐含了一个前提,即居民具备足够的时间弹性来配合投放安排。但事实上,城市中大量居民工作日的时间结构相对固定,难以在特定时段专门完成投放行为。这种制度预设与居民实际生活节奏之间的错位,使参与成本长期偏高,进而导致环保意愿难以转化为持续稳定的分类行为。由此可见,单一的宣传引导难以从根本上推动行为层面的改变,有必要在激励机制设计上予以补充,通过经济激励与社会规范的协同作用,降低居民参与的实际成本,推动分类行为逐步内化为日常习惯。

就环境因素层面而言,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环境和不够统一清晰的政策标准,是上述三类阻力持续存在的重要背景。近年来,外卖餐盒、快递包装等新型混合材质废弃物已成为城市居民日常垃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行政策内容对此类物品的分类指引仍不明确,与居民垃圾产生的实际需求之间出现了明显脱节。各地分类标准不统一、执行规范时有调整,在客观上增加了居民的学习负担,也削弱了其持续参与的意愿。从这一角度而言,政策标准的统一性与稳定性本身就是执行有效性的重要前提,通过立法固化分类标准、明确各方责任、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是从宏观层面消解执行阻力的必要举措。

综合来看,四个层面的原因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在实际执行中彼此叠加、共同制约。理想化政策层面与环境因素层面指向同一个改革出口,政策设计对居民认知成本的低估,与政策标准的调适滞后于社会环境的变化,都需要从制度设计源头加以解决。基层执行能力不足导致场景衔接断裂,目标群体的行为转化机制缺位使意愿难以落地,这两类问题分别对应设施衔接与激励机制的优化。因此,接下来围绕标准简化与统一化、场景衔接完善、激励机制重构三个方向提出对策。

3 消解垃圾分类执行阻力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三类政策阻力及其对应的原因,提出推动垃圾分类政策实际落地的对策建议。

3.1 推进垃圾分类标准简化与统一化

现行分类标准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操作门槛偏高,二是各地标准缺乏统一。垃圾分类标准的制定需要在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之间寻求平衡。只有全体居民形成统一认识,且做到行为上的长期坚持,才能真正促进居民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最终将垃圾分类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因此,建议在政策执行上采用基础分类加弹性调整的双层结构,在全国层面统一划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三类基础类别,同时允许地方根据实际需求增设少量补充类别(如电子废弃物或建筑垃圾)。这种模式既能保证分类标准的统一性,又能适应区域差异,避免“一刀切”带来的执行阻力。同时通过使用智能工具提升分类效率,开发便捷的查询系统使得公众可快速获取常见物品的分类指引,减少因知识不足导致的错误投放。进一步强化生活垃圾分类相关政策的宣传,提高公众对政策内容、执行方式和奖惩机制的了解,通过改变个体的行为偏好和认知来实现政策目标,其优势在于低成本、高效率和高效益[8]。

3.2 推进家庭与公共场景衔接

针对垃圾分类政策执行中家庭端与公共端设施断层的问题,在制度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实现家庭与公共场景的有效衔接,以降低政策执行阻力并提升居民参与的可持续性。

首先,在社区层面合理规划和完善分类设施布局。在家庭端,推广标准化分类工具,如统一标识的干湿垃圾桶及可回收物分装容器,以降低居民初期参与成本;在公共空间,合理设置分类垃圾箱和智能回收站,确保居民在可接受的距离范围内能够便捷完成投放操作。设施布局应结合人口密度、社区规模及居民出行路径等因素进行科学规划,以提升设施可达性和使用便利性。

其次,构建一体化的垃圾分类服务网络,实现家庭端投放与公共端收集、运输、分拣环节的协同衔接。通过引入物联网技术和自动化分拣系统,可实时监控垃圾流向,确保分类后的垃圾在运输和处理过程中不被混合,从而提高分类准确率和政策执行效果。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不仅可提升操作效率,还能通过数据反馈优化设施布局和投放规则,形成动态调整机制,增强政策适应性。

再次，加强社区管理与宣传指导，提升居民对衔接机制的理解和参与认知。社区工作人员可通过定期指导、信息推送和示范操作，帮助居民熟悉家庭与公共场景的衔接流程，同时对常见操作障碍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制度化管理和信息引导，可有效减少家庭端分类成果在公共端因设施不足或操作不便而丢失的情况。

综合来看，通过家庭端标准化工具、公共端智能设施、运输环节管理及社区引导的多层次衔接策略，可显著降低场景断裂导致的执行阻力，提升垃圾分类政策落地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为居民养成长期分类行为提供制度性和技术性保障。

3.3 提升激励机制的有效性

针对垃圾分类政策执行中居民环保意识与实际行为存在脱节的问题，建议建立多元化激励体系，以增强居民的参与动机和行为持续性。

首先，在经济激励层面设计即时性反馈机制。经济激励是影响个人行为决策的物质性奖励，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有效改善目标行为的工具[9]。具体可通过扫码返现、数字积分兑换、社区积分奖励等方式，将居民的分类行为与直接利益挂钩，提高激励感知的及时性和实效性。这种机制能够让居民在短期内感受到行为反馈，从而逐步形成稳定的分类习惯。

其次，注重文化认同和社会规范的塑造，以提高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内在认同感和持续参与意愿。通过开展社区荣誉评选、环保主题活动、宣传典型家庭或个人行为案例等方式，可以将分类行为转化为集体认同感，促使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自觉遵循分类规范。社会规范策略的有效应用一方面有助于突破立足理性决策之上的传统政策工具所忽略的“个体失灵”困境[10]。例如，开展“绿色家庭”认证、组织校园环保实践周等，激发公众的内在动力[11]。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微博平台325条负面评论为核心样本，综合运用词频统计、词云可视化与半结构化访谈，以Smith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分析框架，系统识别了当前垃圾分类政策执行中的三类结构性阻力。分类标准的制定逻辑过于复杂，对居民认知实际考量不足，导致厨余边界模糊、边界物品归类混乱等认知困境长期存在；家庭端与公共端的设施配置缺乏系统衔接，居民完成家庭分类后在社区层面普遍面临无处投放的困境；“定时定点投放”等制度安排与城市居民实际生活节奏之间存在错位，使环保意愿难以持续转化为稳定的分类行为。本文通过Smith政策执行过程模型进行相应的原因分析后，围绕标准简化与统一化、场景衔接完善、激励机制重构三个方向提出对策。标准简化与统一化旨在从制度源头降低公众认知门槛并保障政策的长期稳定；场景衔接着力消除家庭端与社区端之间的执行断裂；激励机制重构通过经济激励与社会规范的协同作用，推动分类行为逐步内化为日常习惯。

研究存在一定局限，后续研究可在数据来源上整合抖音、知乎等平台，扩大样本的平台多样性与群体覆盖面；在方法上引入人工标注对比验证或针对社会议题语料微调的情感分析模型；在研究视角上补充对基层执行人员的访谈，为垃圾分类政策的持续优化提供更为扎实的实证支撑。

参考文献

[1] 吕维霞，刘丰玮. WSR理论视域下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效果提升路径——基于16个社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理论探讨，2025(1)：104-115.

[2] 刘畅，童琳. 垃圾分类大目标背景下的回收指标研究[J]. 环境卫生工程，2022，30(4)：83-88.

[3] SMITH T B.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J]. Policy Sciences，1973，4(2)：197-209.

[4] LIU X，JI X，ZHANG D，et al. How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affe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an empirical study using extended DEA model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9，251(C)：109619.

[5] 于重重，操镭，尹蔚彬，等. 吕苏语口语标注语料的自动分词方法研究[J]. 计算机应用研究，2017，34(5)：1325-1328.

[6] 蔡增玉，韩洋，张建伟，等. 基于SnowNLP的微博网络舆情分析系统[J]. 科学技术与工程，2024，24(13)：5457-5464.

[7] 樊博，朱宇轩，冯冰娜. 城市居民垃圾源头分类行为的探索性分析——从态度到行为的研究[J]. 行政论坛，2018，25(6)：123-129.

[8] 傅鑫媛，辛自强，楼紫茜，等. 基于助推的环保行为干预策略[J]. 心理科学进展，2019，27(11)：1939-1950.

[9] TUMMERS L. Public policy and behavior change[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9，79(6)：925-930.

[10] 蒙克，汪佩洁. 政策科学的范式转移：从经典政策科学到行为政策科学[J].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2018，15(2)：1-19.

[11] 徐林. 以“无废城市”为切入点推进循环型城市建设——循环型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J]. 国家治理，2021(40)：21-25.

Research on the Resistanc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Public Discussion Hot Topics

TANG Jiatong, ZHANG Baos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aste sorting policy, public discussions on social media have provided an authentic reflection of the specific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policy execution. Social media text data was used as its primary sample, combined with data cleaning, word segmentation, sentiment classification and word cloud analysis, supplemented b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identify the main obstacle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ree primary barriers. That is the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of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which do not adequately account for residents' actual understanding; a mismatch between community collection facilities and residents' disposal need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such as scheduled collection times, that are misaligned with residents' daily routin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policy optimizations are proposed in three areas such as simplific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classification rules, coordination between household and community disposal process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versified incentive mechanisms, aiming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waste sorting policies.

Keywords: waste sor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policy resistance